

● 李万健

梁启超对我国目录学的开创性贡献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学者,也是位著名的目录学家。他的目录学研究,开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研究之一代新风;他编撰的《西学书目表》,是我国第一部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图书分类目录,创科学书目分类体系之先。他的目录学成就对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一、梁氏其人

梁启超的生平活动,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同其目录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所以,要了解他的目录学思想和贡献,就有必要先简略了解其生平和思想。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生于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1929年病逝于北京。他出身于普通农村知识分子之家。祖父梁维清是道光末秀才。父亲梁宝英,志在读书治学,一生很不得志,以教私塾为生。梁启超自幼聪敏好学,9岁即能写出洋洋千字的文章,被乡里誉为“神童”,年仅12岁就考中了秀才。15岁到广州高等学府学海堂就读。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次年入京会试,不中。由此在京得读《瀛环海志》,大开眼界,深受启迪。后拜康有为为师。翌年,就学于康有为于广州所办万木草堂,并协助康氏写书、校书,接受变法维新思想,开始关心国家、民族命运。

在万木草堂就读5年,使梁启超的学问大

长,眼界更为开阔,产生了爱国忧民、变法维新思想。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与康有为一起赴京参加会试,康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梁又落第。从此,他结束了求取功名的学业,转而寻求资产阶级的救国之道。其时,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并组织强学会,梁氏成为鼓吹变法维新的中坚,时人并称“康梁”。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到了上海,创办《时务报》,自任主编,撰《变法通议》,连载呼号,成为维新派的出色宣传鼓动家。

辛亥革命以后,梁氏由日本回到国内。曾参加蔡锷等发动的反袁护国战争。后于1918年去欧洲游历,到过英法等国。回国后,到北京、济南、长沙、南京等地讲学。1925年到清华大学主持国学研究院。1926年就任北京图书馆(当时称京师图书馆)馆长,并被美国耶鲁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梁启超才华横溢,知识渊博,著述丰富。他一生留下著作140多卷,计1400多万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教、语言文字等,淹贯经史,参驳古今。这些著述被收编为《饮冰室合集》。其中,关于目录学的著述就有《西书提要》(1896)、《西学书目表》(1896)、《东籍月旦》(1902)、《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读书分月课程表》(1923)、《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1923)、《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5)、《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1925)、《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1926)、《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1926)、《考诸子略现存之书》(1926)、《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1927)等10多种。

二、主张目录学为近现代社会 变革服务,开目录学研究之新风

梁启超的目录学研究及实践活动,是他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政治改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维新、改良思想在目录学领域里的反映。

在我国,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在近现代交替的那个时期,人们一直在寻求国家政治上的自立、经济上的自强之路。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无不围绕这一中心在发生、发展,并为之张目。同这一总趋势一样,梁启超目录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也在于主张目录学要为寻求国家自立自强、为社会之变革服务,并围绕着这一点对其开展广泛研究。他的目录学研究活动及成果,对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研究有开局面、创新风的贡献。

(一)把目录学作为宣传变法维新,宣传西书西学及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工具,为近现代政治经济变革服务。一千多年来,我国目录学一直为封建政治、思想和学术服务,但当我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资产阶级改良的特殊时期,能那样大声疾呼地强调目录学要为改良变法服务,梁启超是第一人,也是对此费心最多、贡献最大的人。诚然,这与历史时期有关,更由于他的思想敏锐、学问博深,特别是他对目录学的深刻认识所致。虽然他不可能认识到资产阶级改良在我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但他看到了中国不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就不能进步的事实。因此,他竭力主张目录学要为宣传西方现代思想和科学,为中国的改革、进步服务。他把西书、西学在中国近现代变革中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他说:“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然欲变士,而学堂功课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农,而农政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商,而商务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官,而官制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而读焉……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1]他高呼:“国家欲自强,以多读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2]在

他看来,有了西书,掌握了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才能实行变法改良,才会使中国富强。他批评象纪昀那样的大学问家,竟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妄言《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世界地理书是“仿中国邹衍之说,夸饰变幻”,“不可一信”;批评象阮元那样的“通儒”,也居然说《畴人传》中古代科学家对天文地理的看法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判道,不可为训”,视自然科学于不见,真是可笑、可悲。他沉痛感叹:“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能知之,若两公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今西人声、光、电、化、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3]他告诫国人,再也不能固守所谓“国学”、“家学”而坐井观天了。他断言,通过读西书、通西学,就会“言矿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日俄,可立待也!”^[4]为了用目录学宣传西书西学,以促进中国社会变革,梁启超下了很大功夫去编撰书目。他先后编撰了介绍西书的提要书目《西书提要》和《西学书目表》,皆发表于1896年。他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西方图书作系统编目的人。《西学书目表》仅3卷正文,就介绍了19世纪末以前20多年来我国所译西书300余种。他指出,虽然这300来种图书对于浩如烟海的西书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内容也渐显落后,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仍是“诧为未见,或瞠目变色”的新鲜东西。“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称,可以粗有闻矣。”^[5]梁氏深知,日本的思想 and 科学就是从西方学到的,认为“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日本离我较近,懂日语的人较多,因此,他又想到应向国人介绍日本图书,借日书向中国传输西方思想和科学。于是,他又编撰了介绍日本图书的提要书目《东籍月旦》,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此目介绍了一批日本人的著作和日人所译西方著作,每书著录书名、著译者、册数、定

价,大多有内容提要,以评判书之优劣,并指明读法。

梁启超关于目录学应为社会和学术发展服务的主张和实践,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对目录学作用和地位的认识较前人更深刻、更明确。梁启超认为,目录学的根本任务是为读者提供方便。他指出:“著书以备读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6]对于书目的作用,他作过深刻分析和概括。他说:“夫目录之书,裨学有四。载籍浩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尽藏,所能尽读,流览诸录,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有解题者读其解题,虽未读原书,亦可知其梗概,为裨一也。书籍孳乳日出,亦散亡代谢,赖有遗录,存彼蛻痕,虽器实已沦,尚可识其名数;又某时代、某类书实始创作或作者独多,某书在某时代已寥落罕闻或散亡最剧,综而较之,学风见焉,为裨二也。稀见秘书,识者知珍,孤微仅存,流传有绪,博稽诸家著录,可以称其展转储藏之所存在,按图索骥,或整理流通,或取裁述作,为裨三也。学术分化发展,著述种类随之而日趋繁赜,辨析流别,业成专门,门类区分,或累代递迁,或因人而异,博观互校,得失斯见,循此以称学海之派分渊汇,察艺林之莠莠条敷,知类通方,此其跬步,为裨四也。”^[7]此外,他还明确提出了目录学是一门独立学问的观点,认为应当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他批评了以往那种轻视目录学作用,把书目著作附于史部的观点和做法。他说:“今簿录之书,存佚单附合计,数目盈千,泱泱一大邦矣。揆其性质,实总函四部而覓其钥,指为史籍枝属,名实未安。”^[8]因此,他在编纂《图书大字典》时,为书目著作单立一大部类,名曰:“簿录之部”。他解释道:“今别建一部,用冠群籍,俾凡研治任何部类之遗典者,皆于此问津焉。”^[9]此论此举,对近现代以来逐渐明确目录学的学科作用和地位,促进其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三)对目录学史和佛经目录的研究卓有成就。梁启超对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很广,见解深刻。除上述对目录学的作用、地位有精辟阐述,

对书目编制及其分类、著录方面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之外(对此下文将专述),在目录学史和佛经目录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他是继章学诚之后最有成就的佛经目录专家。对上起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以来的各种重要经录,他都逐一进行研究,对其作者、体例和内容作分析论述,品评得失。例如,关于《综理众经目录》,他就有中肯评价,他说:“安录虽区区一卷,然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曰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兹学发展之轨迹及诸家派别。二曰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曰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犁然。四曰严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曰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乱,主从分明。凡此诸议,皋牢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10]他将上述总结出的佛经目录五大优点(即著录详尽、辨伪严明、著录甚审、著录佚书、分类详备)同普通书目作比较,深感普通书目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佛录,因而深有感触地说:“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11]他主张普通书目应学习佛经目录在分类、著录方面的优点,以求发展。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对梁氏佛录研究的成就给予了极高评价,他写道:“自尔以还,恍如敦煌洞之发露,殷虚卜辞之出土焉,目录黑暗之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12]文辞虽不免夸饰,但言理确实。

(四)非常重视书目在指导阅读方面的作用,积极利用书目开展阅读辅导。利用书目指导人们读书,是梁氏治目录之学的主要动因之一。其书目著作中,有许多是在著录书名之后,还要详记撰译者、撰译年、刻印处、本数、价格、识语或提要等,为的是让读者“取便购读”。在书目的识语或提要中,也常指明某书“应先读”、“可缓读”或“可不读”等等。其《西学书目表》后附《读西学书法》,不仅讲述了西书翻译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各学科图书间的关系,评判书之得失及译文优劣,还特别说明其中的哪些书应该读,哪些书可以不读,哪些书应读在先,哪些可读在后,等等。例如,在分析了中西数学学习过程上的差异之后,他指出:“西塾课程,率明笔算后,

即习代数;而华若订以为先习天元,后习代数,更更易也。”^[13]在谈到译本西书的电学书时,他说:“十年之电学书,可以一字不读,西人悉弃不用矣。倾中国译出电学数书,皆在十年之前。然必先知旧说之粗浅,乃能说新说之精深,则亦不可以不读也。”^[14]在介绍日人井上圆了的《伦理通论》一书时,他写道:“此书以明治二十年出版,距今十有五年,就日本人读之,觉其成当狗,然适合我国今日之用。”^[15]类此指导阅读的文字,在其书目中屡见不鲜。清光绪十八年(1892),他撰写了《读书分月课程》,分为“序”、“学要十五则”、“最初应读之书”和“读书次第表”,是一部典型的指导阅读的目录学著作。他告诉读者:“读西书先读万国史,以知其沿革;次读瀛环志略,以审其形势;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16]他于1923年编撰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5年编撰的《要籍解題及其读法》,也都是辅导阅读的书目。在目录学史上,在书目著作中如此着力于教人读书者,梁启超首屈一指。

(五)带动了目录学研究,开一代研究之风。梁启超对目录学的广泛深入研究及其成就,引起了近现代学界重视,使许多学者纷纷投身目录学研究,蔚然形成前所未有的研究风气,硕果累累。20年代,他在各地及清华研究院讲学时,就主讲过《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目录学、文献学课程,他热衷于目录学研究和使其发挥作用的精神,广为人知。他的学生中,有许多人都成了卓有成就的目录学家,如姚名达、刘纪泽等。他们发扬了梁氏治学精神,在目录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姚氏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刘氏有《目录学概论》等著名目录学著作。自梁氏之后,到了30年代,我国形成了目录学理论系统研究的新风气,除姚、刘之外,10年里出现的目录学著作还有杜定友的《校讎新义》、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容肇祖的《中国目录学大纲》、刘咸炘的《目录学》、汪国垣的《目录学研究》等,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梁氏目录学研究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梁启超在开我国目录学

研究一代新风方面,功不可泯。

三、发展书目分类理论, 开科学书目分类体系之先

在近代书目分类理论和实践方面,梁启超有创先之功。其主要贡献是发展了书目分类理论,并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书目,首创科学书目分类体系。

(一)深入研究并实践书目分类理论,成就卓著。梁氏对古今书目分类情况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他特别注重于书目分类创新精神的挖掘,阐发了一系列颇具独到见解的分类理论和方法。

他主张书目分类应按照学科发展和文献实际,做到细密详尽分类;应当从图书的不同方面,也即采用其不同标准,对之进行多方面的反映、揭示。他认为:“学术愈发达,则派别愈细分,……此应于时势要求,自然之运也。”^[17]他十分推崇道安、僧祐、道宣等对佛经目录的分类和著录,批评普通图书目录都“太笼统、太单一”,深感佛录“所用方法,有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就书目分类来说,他认为佛经目录“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书之性质分,性质之中,或以书之函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不同交错互见,动至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18]这里,他明确指出,图书分类应以其不同标准重复著录,多次反映,主张分类要细,以便于读者利用。他的这一分类思想,至今也为我们的图书分类实践所遵循。

对于佛经目录的著录,他总结了四大优点:“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例,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蒐采遗逸甚

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19]

梁启超深明文献发展是随学术发展而发展的道理,因而他认为书目分类的不断完善,也是随学术发展、文献发展而进行的。通过对从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至唐智升《开元释教录》的主要经录分类情况的分析研究,他认为,至唐时佛教发展到了盛期,佛学研究到了顶峰,佛学著作也最为丰富,因此佛录分类也发展到了“愈加细密”的地步。他主张图书分类应以学术分类,也即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认为这是“应于时势要求”,是“自然之运”。但是,他又明确阐明了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有区别,认为图书分类只能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而不能完全模拟科学分类。在分析了《开元释教录》的分类有某些与科学分类不同之后,他总结道:“此皆因部帙繁简,姑为划分,以便省览,在学理上非有绝对正确根据,但就目录学的立场言之,则便检查,亦正是此学中一重要条件。智升创此,其功不可没。而后此制录者,亦竟罕能出其范围也。”^[20]这是有史以来,对图书分类应以科学分类为基础,又要根据图书特点及实际而有别于科学分类这一重要原则的最早阐发。

(二)编撰《西学书目表》,首创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书目分类法,开科学书目分类体系之先。梁启超不仅对书目分类理论、方法有深入研究,而且还大力实践这些理论、方法。他编撰的《西学书目表》是我国第一部最完全地冲破四部分类旧制而按科学分类体系类分图书的书目。他是我国近现代以来创立科学书目分类体系的第一人。他的《西学书目表》成书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分为上、中、下和附卷4卷,另有札记1卷。其中上、中、下3卷著录甲午战争以前20余年所译西书300多种;附卷著录通商以前西人译著80多种;近译未印之书和中国人言外事之书200多种;札记,又称《读西学书法》,是梁氏为学生所作读书指导几十则,主要内容是评价书之优劣,为初学者指示读书门径。《西学书目表》正卷、附卷共收录甲午之前所译西书400种左右,加上近译未印之书百余种,这就把

18世纪末之前,我国所译西书基本上作了全面著录,虽收录难免遗漏,但仍可视其为18世纪末期我国所译西书之总目。

梁氏《西学书目表》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之一,是首创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书目分类体系,为我国近现代科学书目分类法之先导,对后来的图书分类法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梁启超将书目分为学、政、教、杂4大部类。但是,《西学书目表》不收宗教图书,故书目中只有学、政、杂3大部类,其下共设28个二级类目,详情如下:

学部: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共13类)

政部: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共10类)

教部(不收书)

杂部: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类可归之书(共5类)

可以明显看出,这个“学”、“政”、“杂”三大部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而那个未用的“教类”,如稍加扩展,即可视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大类了。可见梁启超在100年前已基本上是以科学分类为基础来类分图书了。而在当时,传统图书分类方法已无法适应科学和图书发展需要,到了“不知何以为当”的地步。是梁启超用《西学书目表》的科学分类方法开始为人们指出了书目分类的发展方向。诚然,在今天看来,《西学书目表》的类目归属及设置,尚多有不妥,但这多是和当时学术发展情况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所致。就是在当今,这种对某些学科本质或作用认识上的分歧而使归类失准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

《西学书目表》在设类理论、方法和分类方法方面,也多有创见。例如,梁氏主张类目排列应“先虚后实”,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类目排列原则。他认为“凡一切政均出于学”,虽不能说他认识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道理,但他

的确是看到了科学和生产是社会进步的保证,而且其发展又要有相应的政治作保障的道理。因此,他把学部(自然科学)列为首类,政部(社会科学)从其后。他说:“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由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全体)物(动植物)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议,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农者,地面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21]由此,不仅可以看到梁氏排类贯彻“先虚后实”原则,而且还考虑学科、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思考十分周全。再如,他主张分类表要着眼未来,留有发展余地,有些类目,即使暂时无书,也要设类,以便后来图书增多时,有类可归。《西学书目表》官制一类虽只有《德国议院章程》一种书,但他还设此一类。他解释道:“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讲。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22]又如,一书可归两类者,他主张按内容主旨或主要应用方面归类,即“因其所重”。“如行军测绘,不入兵政,入图学;御风要求,不入天文学,而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入化学,而入医学……”等等。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创书目科学分类体系,对近现代科学书目分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几年以后,徐树兰编成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即仿梁氏而分为学、政两大类。此后,还有徐维则《东西学录》、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沈兆祯《新学书目提要》等,也都抛开了四部旧制,改用科学分类体系来类分图书。

《西学书目表》的另一方面的成就是著录详细实用。此目著录书名、撰译者、刻印处、本数、价格、识语和圈识7项,卢刊本又加著了撰译年号一项。标列撰译者,注重标明译者,体现了梁氏重译书的思想;著录刻印处和价格,是为了方便读者购读;注明册数,是因西装书论册不论

卷,以明书之数量;作识语,是论明读书之道,为读者指示门径;作圈识,是于书名之前加圈号,以其多少来表明书之价值高低。在著录上,为了使书目更实用,梁氏敢于打破旧框框,采用前人不曾使用的方法。例如,用圈识来表示图书价值高低;用“初学宜先读”、“不必读”、“译文劣”等识语来指导阅读等方法,是以往无人采用的,而且,不了解图书内容、没有相当学识水平的人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他说:“表下加识语,表上加圈识,皆为学者购读而设,体例不能雅训,所不计也。惜所识太略,又学识浅陋,未必得当尔。世之君子,尚救正之。”^[23]整个书目著录,都贯穿着梁启超千方百计方便读者的目录学思想。当时的学者甘鹏云曾评价说:“其部次门类,识别优劣,颇便初学。欲寻西学轨途,固无逾是书者。”^[24]这样的评语,可谓是得当的。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见: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3]、[5]、[13]、[14]、[21~23]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见:西学书目表.上海:时务报本,1896
- [4]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见: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10]、[11]、[17~20]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见: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 [7~9]梁启超.中国图书大字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见: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
- [15]梁启超.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6]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见: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4]甘鹏云.西学书目表跋.见:质学丛书初集.武昌:质学会刻本,1896

李万健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现为书目文献出版社副总编。在8种刊物上发文10余篇,出版专著3种。通讯地址:北京文津街7号,邮编100034。

(来稿时间:1992-03-13,编发者:翟凤岐)

ABSTRACTS IN PUBLICATION

(279~298)

From Empirical Library Science to New-type Library Science — A Comment on the Theoretical Change in the Eighties / Fan Bingsi. — 3~10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has achieved a change from empirical library to a new-type one in the 80s and a radical change has been taken place in the fields of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mode of thinking and method of study, 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that from empirical description to scientific spirit. 22 refs.

Library science — Theoretical chang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 China

G250.9

The Production of Libraries / Yu Mingdi and Na Chunguang. — 11~15

By the time when libraries are going in for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y are also carrying out thos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 e.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reproduction of users. The 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libraries are of double nature —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ose activities that produce value as well.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et hold of this point of view for evaluating social functions of libraries. 13 refs.

Library science — Theories

Libraries — Nature

G250-03

The Initiative Contribution of Liang Qichao to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Scientific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a / Li Wanjian. 16-21

Being a celebrated political activist, thinker and schola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Liang Qichao was also a bibliognost, an erudite and a man overflowing with talent. Throughout his life, he left to the world a variety of writings covering economic, philosoph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ubjects which numbered about 14 million words and more, among which there are more than 10 books on bibliography, such as: Abstracts of Western Books, Bibliographical List of Western Learning, etc. He held that bibliography should serve the social change and make things easy for the users' convenience. He also put emphasis on the bibliographic function of guiding the users to read. His theory of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set a precedent for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which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of China. 24 refs.

Liang Qichao — Appraisals and evaluations

Bibliography — Modern times

G257